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

主 编◎ 达力扎布

#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XIANZHE XIYAN: TUBOSHI YIZHU

原著 / 巴卧·祖拉陈瓦

译注 / 黄 颢 周润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XIANZHE XIYAN: TUBOSHI YIZHU

原著 / 巴卧·祖拉陈瓦

译注 / 黄颢 周润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等译注.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81108 - 785 - 7

I. 贤… II. 黄… III. 藏族—民族历史—中国—古代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670 号

###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

作 者 巴卧·祖拉陈瓦  
译 注 者 黄 颢 周润年  
责任编辑 仁增旺姆  
装帧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热瓦迪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9.25  
字 数 8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785 - 7  
定 价 19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王尧

## 一

记得是1954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西藏的代表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二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以外，还有一大批西藏著名人物、社会显贵、寺庙高僧和名门望族的官员、勋贵、学者等，其中还有一位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当时先师于道泉（伯源）教授听说他手里带着一部藏文史书《贤者喜宴》（mkhas-pavi-dgav-ston），于老夫子久已闻听这部书的大名（意大利的藏学家杜奇教授在他主持的罗马大学东方学丛书上已经宣布了《贤者喜宴》将由他翻译出版的消息）。他老人家急切希望能见到这本名著。于是跟王森（雨农）先生商量，要把这本书从赤江活佛手中借出来。当时我正在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翻译科做个小学徒，有些方便，几经交涉，说了很多好话，居然从赤江活佛手中借了出来。二位先生喜之不禁，于是商定（全书共700多页，A、B两面）用胶卷照了下来，又一一冲洗放大，粘在一大簿子上，就成了“照相本”（资料应收藏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花了800多元，按当时的物价可是一大笔开支，当时助教每月工资56元，可以说相当于一年半的工资了。

不久，我们进藏工作后，又收集到山南洛扎寺版的印本，这就是“木刻本”。于是由民族出版社铅印排版，到出版发行已在1985年了，仅仅重印过几次，这是“铅印本”。经过多年教学中频频引用，引起藏学界注意，后黄颢同志花了相当气力，把“吐蕃史”部分摘译并加以注释，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发表。黄颢同志于1959年中央民族学院藏语专业毕业，又考入学部民族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后在民族所历史组长期从事藏族史研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直在努力垦荒，在藏族史料的翻译、整理研究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与贡献。可惜他英年早逝，后面的许多章节由周润年同志续译而成，就是现在大家见到的“汉文译注本”。周润年同志，1975年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工作。几年后，转到教学岗位，孜孜不倦，努力工作，曾参与翻译了《藏族古代法典》、《红史》、《萨迦世系史》等多部藏文史籍，长期从事藏文史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取得很好的成绩。如今又将《贤者喜宴》中的“吐蕃史”全部译完，即将付梓出版，令人高兴。润年征序于我，义不容辞，介绍了当年的一些往事。

据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生前所撰《贤者喜宴》作者小传所述，二世巴卧·祖拉陈瓦，1504年出生，1566年故世，寿63岁。拉萨地区业塘地方人氏，为“尼牙”（gn-yags）族，父名喇嘛达尔，母名拉尼卓玛，是他们三子之中子。五岁被确认为“巴卧曲

序

1





旺伦珠之转世”，迎到洛扎卓卧寺坐床、受教；九岁时从四世噶玛巴红帽派曲吉扎巴受沙弥戒；二十九岁与第八世黑帽派大宝法王噶玛巴不动金刚相会，得名“大德祖拉陈瓦”。有多种著作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贤者喜宴》。这部书取材丰富广泛，而且吸收了大量原始资料，收集到吐蕃赞普诏告、会盟誓辞、吐蕃小邦、氏族分布、五茹六十一东岱名录等等罕见史料，有重要历史价值，受到广泛注意和大量引用，在藏族古代历史文献中最受关注。全书分为五大章，计为：

- 一、世界形成章
- 二、天竺之章
- 三、吐蕃古代之章
- 四、于阗、汉地、西夏（木雅）、蒙古、汉地晚近之章
- 五、大小五明之章

其最为重要当为第三章，也是全书与众不同的精华所在，受到广泛注意。因为在洛扎卓卧寺刻板，故称《洛扎教法史》，而《贤者喜宴》乃藏族学者常用一藻饰性名称，并以此名世。

## 二

藏族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民族，流传至今的藏文史籍不仅卷帙浩繁，在我国的民族古籍中占领先地位；而且门类齐全、体裁各异，各种类别的文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藏文史籍为研究藏族历史和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历史、中亚地区历史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对藏文史籍的发掘和利用，既是史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从事藏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 （一）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一直占有主流的思想地位，自唐代以来，藏文就是传播佛法的文字。所以，我们会发现藏文史籍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宗教密不可分，成了所有藏文史籍共同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伴随着藏族史学水平和文学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内地历代史学方法的影响，先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体裁的史书，如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史、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不一而足。虽然各种体裁的分野并非壁垒分明，而有较多的类同，特别是后期，许多著作既是史册，又是世系史或教法史，从标题上反映出来。藏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各类史籍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史籍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二是不同种类的史籍也有互相趋同的倾向，许多不同名称的著作在体例上表现出了较多的类同，但大体说来，它们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以下分类予以介绍。

#### 1. 编年史

藏文称为 lo-rgyus，意为按年纪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编年史是《吐蕃王统纪年》。在敦煌文书中它是一份残卷，即英藏斯坦因敦煌文书卷 750 和法藏伯希和

P. T. 1288 号写卷，它是当时吐蕃王朝及附庸吐谷浑的编年史。编年史的撰述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只需将每年发生的大事编串起来就行，不需要作很多加工和分类整理工作，因而它是最早为藏族接受的史书体裁，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唯一的一种史书类型。吐蕃分裂时期出现的《巴协》(sba-bzhed)，也号称大编年史，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叙述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二代赞普的史事的编年史。13—14 世纪，入元以后，随着教法史和史册类著作的出现，编年史著作逐渐减少。虽然教法史和史册也都有很重的编年史倾向，但离纯粹的编年史的距离已经很远了。但编年史作为一种史书体裁一直保存下来，而且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期的编年史的内容无所不包，不再像《吐蕃王统纪年》那样，每年下面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内容。我们以《青海史》为例说明编年史的特点。《青海史》用非常准确的资料，将青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著名人物的活动、地理等内容，全都按年编排在一起，它不太强调宗教事件，更少涉及教义、经典等内容，因此比教法史、史册都容易被读者作为历史来接受，它的文字也比较平直，没有很多渲染、夸张的描述。

## 2. 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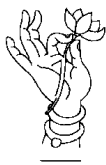
藏文称为 Deb-ther，这是一个波斯语经过蒙古语而来的借词，原型为 dabtar，意为文体、书本、记录。藏族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古人这个中间转介接受这个词的。蒙古人较早使用了这个词，在《元朝秘史》中就有“阔阔迭卜帖儿”（意为青册）这个名称。而西藏的第一部史册《红史》的蒙古书名，即为“忽兰迭卜帖儿”，意为红册。史册类著作在各类藏文史著中居于领先地位。继《红史》之后，又有《青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等相继问世，连近人根敦群培也将自己关于西藏古代历史的著作定名为《白史》。这类史著一般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叙述世界和吐蕃的来历，即记载佛教的源流，然后是印度、尼泊尔、汉地、西夏、蒙古的王统；第二部分是西藏的历史，先述吐蕃王统，然后记载各个教派的历史。这种修史体例对后世影响极大。后出的藏文史书有的虽然名称不叫史册，但形式与史册大同小异，例如著名的《汉藏史集》，它的前半部分内容与《红史》大同小异，后半部分在记述各教派历史时，没有涉及很多教法传承的内容，而是保存了许多藏汉文档案，且对被《红史》忽略的一些地方势力也作了必要的交代，因此比《红史》更具时代感和史料价值，但在体例上仍然与过去的史册一致。到后期史册类著作与教法史类著作已有趋同的倾向，有些干脆合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vbyung) 又名《史海》(Deb-ther-rgya-mtsh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藏族史册类史籍还对蒙古族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与明以后出现的蒙古文史籍，大都借用了藏文史册类史籍的编撰模式，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白史》等蒙古文史籍，都以不小的篇幅述说印度、西藏王统和佛教的源头，并将蒙古族的起源与印度、西藏附会在一起。

## 3. 教法史

藏文称之为 Chos-vbyung，意为法源或为教法源流。最早的教法史，即著名的《布顿佛教史》，它总述了印度和西藏的教法源流，并附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的目录。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各教派传承的教法渐趋固定，便相继出现了一批总结





某个教派或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著作，著名的有《珠巴教法史》、《达隆教法史》、《贡却伦珠教法史》、《噶当教法史》、《安多政教史》和《洛扎教法史》等。尽管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对佛教历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的内容，但它与其他类型的史籍相比，要明显侧重于教法传承的历史和对各教派之教义、经典的阐释，以及对一些宗教大师的生平著作、寺院修筑情况的记载，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最好素材。但很少直接牵涉政治史的内容。

土观罗桑曲结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虽然书名不是教法史，而是 Grub-mthav，意为教派奥义，但实际上也是一部教法史。它与前述教法史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教法史。土观此书不仅叙述佛教总的历史和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历史，而且还叙述汉地儒教、道教、佛教史和蒙古、于阗、香巴拉等地的宗教史，甚至对西藏本教的教义、大师、传承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 4. 王统记

藏文称作 Rgyal-rabs，意为王族传承世系。这类史籍最早形态是《红史》等书中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王统等章节。它只是简单地罗列王族或赞普的传承世系，以后渐渐超出这个范围，演变为以世系为纲，分目详述其政教事迹的新型史书。一个家族的天降传说、宗教信仰、政治活动，施主的宗教行止，寺院建筑、圣物名目等都成了王统记所记载的内容。王统记一方面继续保持编年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其需要掺入大量的宗教和政治内容。后出的王统记则完全将王室的政治活动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的结盟与战争完全看做是宗教行为。最著名的王统记是索南坚藏的《西藏王统记》（又译《王统世系明鉴》），它是以吐蕃赞普世系为纲，分述整个吐蕃王朝政教、人物历史的断代史。另外，还有一本著名的王统记事《拉达克王统记》，此书前半部分一般叙述印度和吐蕃王统，后半部分则专门叙述历代拉达克王族的政教事迹。王统记和史册类史籍在后期也有趋同的倾向。例如根敦群培的《白史》，全名为《全西藏政教两途之王统白史》。

#### 5. 世系史

藏语称为 Gdung-rabs，意为家族传承世系。世系史与王统记颇为类似，只是王统记叙述吐蕃王族的世系，而世系史叙述各教派所依附的某个家族的世系；世系史与各教派的教法史也比较接近，但教法史侧重于对教法的传承、教义、经典修行方法的阐释，而世系史相对来说更注意人物的活动、家族的兴衰、寺院的兴建、对外交往以及行政管理等内容的记载。它是研究一个家族、一个教派兴衰历史的最好资料。著名的世系史有《朗氏宗谱》（或译《朗氏宗谱·灵犀宝卷》）和《萨迦世系史》，前者成书较早，专门叙述伯木古鲁派和朗氏家族的历史，它对朗氏家族的来历、兴盛，特别是它在元代与其他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并吞各部的历史记载甚详。后者尽管成书较晚，但它所依据的资料的是《萨迦世系口饰》等四五种早期史著和藏于萨迦寺的大量元代政治档案，书中收录了元代皇帝颁发的一些诏诰和萨迦高僧给元朝皇帝、西藏僧俗头人的信件，弥足珍贵。《萨迦世系史》与《朗氏宗谱》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它较多地将笔墨集中在萨迦的高僧大德身上，而对于世俗人物的注意则远远不够。它分别用 110 页和 79 页的篇幅叙述了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事迹，而对于八思巴的弟弟

白兰王恰那朵尔杰则仅用了八行就一笔带过了。藏文史籍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极不重视非僧人的政治活动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缺陷。

## 6. 传记

藏文传记类文献有两种形式，一种称为 rnam-thar，叙述一位高僧从出生到圆寂的所有事迹，它分为内传、外传和秘传三个部分，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高僧和中世纪欧洲相当普遍的圣者传记，主要记述某位高僧学经、修法、游方、著作及其培育弟子、修筑寺院等内容。由于许多高僧大德都是他以前某位著名高僧的转世，因而他的传记往往都与其前世有关，也必须简略地记载其先世的生平事迹，因而 rnam-thar 有时也被称为 skye-rabs，意为转世世系。rnam-thar 类传记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位著名的高僧都能找到他的传记，比较著名的有《米拉日巴传》、《萨迦班智达传》、《布顿仁钦珠传》、《唐东杰伯传》以及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这类传记除了是研究某个人物的最佳资料外，也是研究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情况的宝贵素材。同时，根据书中先师的高僧足迹，可以构拟西藏的历史地理，确定不同时期人口的流动情况。另外，还有许多传记中保留了一些编年史的片断和许多关于寺院的建筑和特点的记载，这也是弥足珍贵的。rnam-thar 的写作方法千变万化，有的行文平淡，用口语写成；有的用诗体，辞藻满篇，充满诗韵。

另一种称为 Rtogs-brjod，即 mngon-par-brtogs-pa-brjod-pa 的简称，这个词规则地翻译自梵语 Avadana，或 Jataka。Avadana，原意为譬喻或出曜，是用隐喻或故事的十二种形式来说明教义的经典之一。后引申为对能够用佛经中的一个例子或故事来解释的特殊事件的描述。Jataka 则是关于佛陀本生故事的传记。这两种形式常常混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散文体作 Ava-danasataka，又可用颂偈体作 Ksemendra 或 Avada-naKa-palata。Rtogs-brjod 类传记一般只记载某人一生中某个时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整个人生的事迹，比较著名的是朵喀夏仲才旺结的《颇罗鼐传》(mi-dbang-rtogs-brjod) 和《噶伦传》(Bkav-blon-rtogs-brjod)。前者通过颇罗鼐的生平记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西藏地区的重大事件；后者则用主要笔墨叙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阿尔布巴叛乱和珠尔墨特叛乱事件。

## 7. 地理志

藏文地理书出现的时间很晚，到十九世纪才有较完整的地理著作问世，数量也极少。最著名的是钦则的《卫藏圣迹志》(Dbus-gtsang-gnas-yig) 和敏珠儿诺门汗的《瞻部洲志》(vDzam-gling-rgyas-bshad，或译《世界广说》)。圣迹志即所谓圣迹指南，是具有很大实用性的地理书，编写这种书籍的目的在于为朝圣的香客提供道路、山口、寺庙等情况，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标明了每个圣迹的名称、地望，从一个圣迹到另一个圣迹所花的时间、路线，清楚地展示了这些地区的山川、道路面貌。另外它还对各寺院的建置沿革、著名大师和所藏身、语、意三门秘密作了记载。《瞻部洲志》顾名思义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作者在北京从一些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关于世界各大洲的地理知识，因此，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地理情况都作了叙述，而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关于西藏地理的记载。它的写作方法与圣迹志基本相同，而内容扩大了很多，除了卫藏以外，还包括阿里三围和朵甘思六岗地区。







藏文文献中还有一种名为路引(Lam-yig)的地理书,它也是一种朝圣、旅行指南,内容与圣迹志(gnas-yig)相仿佛。例如六世班禅罗桑班丹意希所写的《香巴拉路引》,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桑结嘉措的《黄琉璃》在记述格鲁派历史时,也兼述地理状况,是一部格鲁派寺院志。《安多政教史》则是青海和四川东部的寺院志。噶陀司徒写成了二十世纪的《巡礼记》,以日记体裁,详细记载寺院名称、特色和路程,可补充《卫藏圣迹志》的记载。

#### 8. 寺庙志

藏文称为Dkar-chag,意为目录,或称为寺庙传承史(gdan-rabs),主要记载各大寺院的兴建、主要建筑的修造经过、布局和寺院内收藏的主要佛宝,包括典籍、偶像和佛塔的目录等;另外也记载寺内住持的生平、寺院之施主名册和供养物清单等。寺庙志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清两代。比较著名的寺庙志有公哥仁钦的《萨迦寺志》、多罗那它的《觉囊寺志》、五世达赖喇嘛的《大昭寺志》、阿旺江巴的《四寺志》、噶伦霞扎旺秋的《桑耶寺志》等。寺庙志的篇幅和重要性依它们所描写的寺院之声誉的大小而各有不同,有的只有薄薄的几页,有的则洋洋万言。在寺庙志中往往能发现一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找到的地方传说,有时它们叙事的范围也不只是一个寺院,而是涉及这个寺院所在的整个地区。寺庙志中大量关于寺院建筑和艺术造像的记载是研究西藏建筑史、艺术史所必须掌握的资料。由于寺庙志是为香客提供的一个导游手册,因而一般说来,它的文字尚平直,常用散文体写作,而其形式则比较精巧。

#### 9. 年表

藏文称之为Revu-mig,本义为山羊眼睛,颇似格子,取其形似而已,通译为方格年表,又因这种年表专门记述有关佛教的大事,所以又称为佛历表(Bstan-rtsis-revu-mig)。它是在编年史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大事年表。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能使读者方便地检索各类大事,并准确地确定其年代。最著名的年表有松巴堪布的《方格年表》和嘉木样谢贝多吉的《佛历表》,前者记载自藏历第一胜生第一年火兔年(北宋天圣五年丁卯,1027),共720年史事,每年之下列有此年发生的政教大事,为研究西藏史之最佳工具。后者纪事的始年与前者相同,终年为第十二胜生木羊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它逐年罗列了688年藏区宗教界所发生的大事,其内容多与宗教活动有关,间或插入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与前者相比价值稍逊一筹。

#### 10. 名人录

藏文称之为ming-grangs,几乎相当于近现代常用的who is who。它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各位高僧大德或著名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迹,文字非常简洁,间或也抄引一些古代文献的原始资料。这类著作以隆多喇嘛阿旺罗桑著的《佛教名人录》和《佛教施主名人录》最为著名。前者成书于1779年,专门记载西藏佛教名人的身世和教法传承情况,尤详于格鲁和噶当两派。后者成书于1777年,他从《青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等史书中,提炼出西藏历史的主要线索,浓缩成一册,专述西藏政治史上的风云人物,也辑录一些有关历史事件的原始资料,如乌思藏十三万户目下就转录了《五世达赖传》中有关各万户户口的记载。这两部名人录是可以相互补充、参证的

姊妹篇。

### 11. 全集

藏文称之为 Gsung-vbum 或 Bkav-vbum。这是藏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部分，自元以后的高僧大德，几乎每一位都留下了洋洋可观的全集，也有的是同一教派的几位大师的合集。十八世纪末，隆多喇嘛编纂的《噶当、格鲁派高僧文集简目》收文集 40 家。十九世纪中叶，仲钦·喜饶嘉措编《罕见书目》，分藏文典籍为十二类，其中文集类收 90 余家，1959 年，《甘肃拉卜楞寺书目》中分十七类，文集类收 174 家。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由杰雅·贡布先生主编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共收文集 180 余家，足见此类著作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与汉地文人、学士和宦宦、士绅的文集一样，藏族高僧大德之文集的内容也很庞杂，且绝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经论的注疏和笺释以及有关大小五明的著述。但也有小部分是历史著作，或很具史料价值，收有其他各类史书难以吸收的内容，如有关的档案文书、来往书信、皇上的诏令文告等。全集中出现的许多内容既可补充其他史书之不足，提供新的史料，也可以订正其舛误和疏漏之处。比较著名且史料价值较高的全集有《萨迦五祖全集》、《隆多喇嘛全集》等，而《布顿仁钦珠全集》则被誉为藏传佛教的百科全书。

## （二）藏文史籍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大量藏文文献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人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藏文史籍既能为其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提供最丰富的资料，使藏族历史的研究既能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也在于它能为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的历史和中亚地区的历史，提供许多新的资料。藏文史料的出现才使它们的历史面貌一新，若没有藏文史料，则在他们的历史上都将遗憾地留下许多空白。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藏文史料对于研究西藏历史的意义。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是以汉藏文史料为基础的。在我国历史上，汉、藏两族之间长期友好往来，不断融合，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地理的阻隔和语言文字的障碍，因而汉族人对藏族地区的了解非常有限。现存有关西藏的汉文文献，特别是清以前的文献寥寥可数，而且就是仅有的一些资料也因受到作者观察角度、材料来源和思想观念的局限而出现许多的错误，因此这个基础是极不牢靠的。只有将对西藏历史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丰富的藏文历史文献上，并参证以汉文史料的记载，才能使之立于科学的高度，否则难免雾里观花，隔靴搔痒，以致事倍而功半。

相对于宋、元两代而言，唐代留下的关于吐蕃的汉文史料算是比较丰富的，除了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以外，《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全唐文》等书中，都有不少珍贵的史料。苏晋仁先生曾辑录，有利于学者使用，研究吐蕃王朝史，不能不重视这些汉文史料。但若光凭这些，则远远不够。因为在汉文史料中对吐蕃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缺乏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几种文献之中，也有一些互相抵牾的记载，还有许多用汉文音译记载下来的名物、制度，无法探明其渊源所在。显而易见，要将吐蕃史研究引向深入，还必须吸收新的养分。这个新的养分便是几经辗转





而终于重见天日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它是当时、当地人记载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出现和一批藏文金石录、简牍的利用，使吐蕃史研究摆脱了困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量汉文史籍缺载的新史料，如吐蕃的军事、经济、政治制度、人口情况等，从而使吐蕃历史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且还纠正了汉文史籍中的不少谬误，印证和补充了汉文史籍的某些记载。许多在汉文史籍中找不到头绪的问题，在藏文史料中涣然冰释。

自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开始，到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为止的400年间，西藏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中原汉地也先后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和宋、辽、夏、金几个政权鼎立的局面。虽然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从未中断，特别是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往来较前有所发展，但双方的联系与唐代相比毕竟要少了许多。因而汉文文献中关于这个时期西藏历史的记载极为贫乏；就是犹如天女散花般植于茫茫文海中的零星记载，也多半是关于安多和康区藏族的情况，而关于卫藏地区的记载实难觅得。毋庸置疑，这四百年西藏历史的重建只能依靠藏文历史文献。尽管从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藏文文献并不多，而且都是一些伪托的“掘藏”，但后出的教法史、史册大多辟有专门的章节，记载这个时期的历史，例如《布顿佛教史》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介绍后弘期佛教的发展史。几乎每一个教派的教法史、世系史在叙述其肇始、兴盛的历史时，都要着力描述它们在这个时期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因为除后期的格鲁派以外，藏传佛教各宗派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具备其各自的特色的。另外，叙述这个时期高僧生平的传记，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素材；如《米拉日巴传》、《玛尔巴译师传》等传记中关于当时乌思藏地区社会、宗教生活的描述，实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好资料。总而言之，只有从大量的藏文史籍中去追根溯源，将每个教派的渊源和形成过程搞个水落石出，然后才能重新构拟当时整个西藏的总体面貌，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元朝统一并有效地管理了西藏地区，从此西藏历史与中原历史的关系愈加紧密了。西藏作为元朝统治下的一个行政特区，它的历史自然就是元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官修正史《元史》的纪志表传中，相应地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体制、职官、地理、人物、宗教等作了一些重要的记载。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站赤》中也保存了不少关于西藏站赤的记载。但由于《元史》成书仓促，许多重要内容被忽略了，显然还不足以搞清元代西藏历史的全貌。明代也是如此，它基本上因袭了元朝在西藏的统治制度，并发展了元代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明代以来汉地的西藏高僧人数众多，而从汉地去西藏的使者也大有人在，藏汉两族之间的交往极为频繁，这些在《明实录》中都作了相应的记载。但对于西藏本身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甚至这些高僧的来历，汉文史料中不是完全沉默，就是语而不详。要深入研究元、明两代的西藏历史，同样必须借助藏文历史文献。

元、明两代出现的藏文史籍数量多、门类齐，应该说是研究这个时期西藏历史的主要史料。不少成书于清代的藏文文献对于研究这两个朝代的西藏史同样很具参考价值。比较重要的藏文文献有《红史》、《青史》、《朗氏宗谱》、《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新红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史》、《萨迦班智达传》、《布顿仁钦珠传》、

《沙鲁世系史》、《萨迦五祖全集》、《历辈噶玛巴高僧传》、《历辈蔡巴派高僧传》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明朝初年的《汉藏史集》的出现，使元朝西藏史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进步。书中关于西藏驿站、括户、十三万户的记载和藏族宰相桑哥的传记等，不仅为元代西藏史提供了不少新内容，而且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老问题。

清代对西藏的统治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汉藏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空前紧密。特别是驻扎于拉萨的驻藏大臣及其随员不仅代表中央王朝行使其统一管理的职责，而且也频频地向朝廷呈上有关西藏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报告。一时间关于西藏的汉文文献骤然增多。除了《清实录》中的常规性记载外，又出现了一批专门性的著作，如《西藏志》、《卫藏通志》、《圣武记》、《皇朝藩部要略》、《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格尔方略》、《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平定金川方略》、《国朝耆献类徵》等。另外还有许多驻藏大臣的奏牍，较重要的有《清季筹藏奏牍》、《联豫驻藏奏稿》、《赵尔丰川边奏牍》均由吴丰培先生辑录出书，功莫大焉。相对于以前几代来说，清代汉文文献对于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意义重要得多。但藏文文献的主导地位仍然是无可替代的。例如要研究十八世纪早期西藏、清朝和准格尔势力在西藏地区的角逐、罗卜藏丹津起事以及阿尔布巴叛乱、珠尔墨特叛乱等事件，若不能利用《颇罗鼐传》、《多仁班智达传》、《噶伦传》等藏文文献是不可想象的。另外，自第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开始的历辈达赖、班禅的传记、全集也是研究清代藏族史之最直接的史料，而保存至今的一大批清代藏文档案，则更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宝库，清代西藏的研究要走向深入，非利用这些藏文政府官方档案不可。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藏文史籍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在藏族的历史上，藏族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今天的西藏地区，吐蕃王朝的势力在古代西域（今天的新疆、河西和中亚部分地区）活动了170余年。而现在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即古代之朵甘思和朵思麻所包括的地区，本身就是古代西藏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藏文史籍中自然留下了不少关于这些地区的记载。自元朝开始，蒙古人普遍地接受了喇嘛教，藏族宗教文化也给蒙古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蒙古方面与西藏的关系也很密切，因而藏文资料中有许多关于蒙藏政治、文化关系的记载，也有专门记载蒙古地区喇嘛教传播历史的专著。藏文史籍对于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弥足珍贵。

对吐蕃占领下的西域的认识，以往只能依靠以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为主的汉文史料。这些史料大多数只涉及吐蕃和唐朝在西域进行的军事争夺过程，而关于吐蕃统治下之西域的部落、行政组织、军队、经济、法律、宗教等内容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因此在应用藏文史料以前，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关于西域的藏文文献有大部分，一部分是在敦煌发现的藏文卷子，大多数收录于英人托玛斯编辑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中，它分成七个部分：1. 吐谷浑；2. 沙州；3. 罗布泊；4. 于阗；5. 突厥；6. 政府组织和社会状况；7. 吐蕃军队。第二部分是在慕士塔克、米兰等地发现的460余支藏文木简，内容涉及经济、军事、部落、文书、宗教等各个方面。除此以外，在《吐蕃王统纪年》中也有一些关于675—760年间吐蕃和西域诸王





国之间外交和战争关系的有价值的史料。

藏文史籍对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性，还可从六部关于于阗的藏文著作中略见一斑。这六部著作中有五部是采用佛陀或于阗佛教圣者所说预言的形式写成的，它们是：《无垢光校订的经籍》、《牛头山授记》、《阿罗汉根敦培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于阗教法史》。这些著作内容丰富，涉及宗教、地理和历史等问题，是研究古于阗史不可缺少的资料。英国学者埃默瑞克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文书，先后刊布了于阗国授记的校勘、翻译本，以及《于阗教法史》的刊本，后又出版了这两本书的译注本，名为《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

敦煌藏文卷子中还有一份关于研究北方民族史很有价值的文书，题为《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它是八至九世纪间记录并书写成藏文的。它记载了八世纪后半期在从古代高丽和南西伯利亚，到天山山脉的广阔地区内活动的各个民族的名称、地理分布、语言、生活习俗等内容，是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史的一份宝贵资料。

藏文文献中记载甘、青、川边地区的著作也有不少，最著名的有《安多政教史》、《青海史》。前者专述安多地区主要寺院的历史、佛教各派的主要人物的生平、教法传承等情况；后者则用非常准确的资料，按年代编排了1570—1768年间青海地区的历史和山川风貌，同时也涉及四川、云南、甘肃及西藏的地理和宗教状况。除此之外，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寺庙志也可为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提供很多资料。如《宗喀巴传》、《德格土司传》、《松巴堪布传》、《历辈章嘉呼图克图传》、《塔尔寺志》、《佑宁寺志》等，都不可不重视。

济美南喀在1819年写成的《蒙古佛教史》，全称为《叙述正法在大蒙古国兴隆的胜教宝灯之光》，即日僧桥本光宝翻译的所谓《蒙古喇嘛教史》。作者是一位出生于西藏，而久居于蒙古寺庙中的僧人。此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蒙古政治史，先简述西藏王统，即对元朝到清朝的蒙古王统和历史作了叙述。第二部分是蒙古佛教史，对佛教通过元、明两代西藏高僧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记载很详细，还对宗喀巴宗教改革、第三、四世达赖喇嘛的传教活动也作了记载。此书不仅对研究蒙古族的历史，特别是蒙古教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蒙藏关系史者也是不可不读的一部著作。

藏文史料对于汉藏关系史、中原王朝史研究的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藏文文献出现有许多汉文资料缺载或因载籍疏略莫能详述的人物、事件的记载，甚至有些已经佚失的汉文资料，会出人意料地从藏文史料中找出一些片段。我们不妨以元朝为例。藏文史料中有许多记载可补元代汉文史料之不足。如《汉藏史集》中关于元代著名的敛财之臣桑哥的传记至少可以部分地改写桑哥的历史，并稍稍改变人们对于敛财之臣的一边倒的看法。在汉文史料中记载桑哥是一位极为贪婪、残忍的角色，而《汉藏史集》中的桑哥却是精明强干、富有同情心的善良大臣。更重要的是《汉藏史集》纠正了以往穆斯林文献记载桑哥为畏兀儿人的错误说法，明确记载桑哥是元朝的藏族宰相。《大元通制》是元代一部大型政书，至今已不复存在，而在《汉藏史集》有关元代西藏行政组织、括户、驿站等记载中，却保留了《大元通制》中的若干内容。还有在汉文文献中只笼统地描述了元代汉藏间友好往来的盛况，但其具体情形则不甚了了。而在

《沙鲁世系史》、《萨迦世系史》以及一些人物传记中，都有名有姓地记载了前往汉地朝覲的藏族官员、高僧和一些来西藏的汉地官员的活动，如《布顿仁钦珠传》中记载了元朝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带领上百蒙古人来到沙鲁，接受布敦大师之灌顶的事迹。所有这些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汉藏之间政治、文化交流之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我们对中原王朝历史的认识。

最后，谈一下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印度、不丹、尼泊尔等邻近国家历史的价值。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是佛教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结合而演化出的奇花异果。印度宗教文化对西藏的多方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藏族文化有很密切的联系。而同样藏族文化也反过来对印度文明产生了一些影响。从十二世纪开始，伊斯兰势力进入印度，佛教在它的老家渐趋势微，保存至今的梵文经典寥若晨星，而且古代印度没有写史的传统，没有专门的历史书问世，因而只有利用大量的藏、汉文典籍和史志，才能部分地复原出印度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总体来说，古代藏族学者研究佛教历史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印度本地的学者。藏文文献中除了大量翻译过来的经典和关于大、小五明的著作外，还有许多记载印度教法史的文献。几乎每一本史册和教法史类的著作，都有专门章节记述印度的王统和佛教的源流。另外，还有一部专门叙述印度教法史的著作，它便是觉囊派高僧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此书写成于1608年，主要叙述印度和邻近地区佛教晚期历史，书中对后期大乘派的历史、教派的分立、著名人物生平都有记载。它的资料来源于从西路进藏的印度人的口述，这些口碑材料虽然未经严格甄别，也包含有一些传奇性的内容，但仍提高了多罗那它这部著作的权威性。作者通过收集、整理这些印度人的回忆，并参证其他古代文献，使许多暧昧不清的史实得到了澄清。《印度佛教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迄今为止已有施夫纳(F. A. Schiefner)的德译本、寺本婉雅的日译本、清巴(Chimpa)喇嘛和查托帕达那(A. Chattopadhyana)的英译本和张建木先生的汉译本等多种译本问世。

拉达克地区即古代之阿里三围之一的玛域(Mar-yul)地区，《大唐西域记》中称它为秣逻娑，此即为藏语 Mar-sa 的音译。现代的拉达克属印度管辖。而古代拉达克王国的历史则完全要依靠藏文史料来重建。正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先生所言：“研究拉达克历史的主要史料，现在是，也将永远是《拉达克王统记》。”此书除述及一般吐蕃历史及元明之际藏族史外，主要叙述直至十五世纪的拉达克王统史，这是其他任何史书所不及的。此书最先有弗兰克(A. H. Franke)的刊本和译文。毕达克的《公元前950—公元1842年的拉达克王国》一书，主要就是根据《拉达克王统记》提供的史料，另外还加上藏文《达包热巴传》和许多藏文碑铭史料写成的，这是目前研究拉达克史的最权威著作。

不丹地处西藏南部，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十二世纪中叶，噶举派高僧帕玛多吉在主巴(vbrug-pa，即布鲁克巴，今之不丹)传教建寺，创立了噶举派。不丹的历史在英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以前，在疆域、语言、宗教文化上都与西藏连为一体。在藏文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专门叙述不丹历史的著作，常用的有《络绒教法史》、《Hun-ral世系史》、《萨衮杰波世系》、《主巴地神世系》、《主巴活佛通钦阿吉旺布大诏令集》等。英国学者爱理斯主要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颇负盛名的著作《不丹，一个喜马拉雅





雅王国的早期历史》。

尼泊尔也是一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王国，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它就与西藏建立了联系。在古藏文文献中，尼泊尔被称为 bal-yul。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专门叙述尼泊尔历史的藏文史籍，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藏文史籍中都有关于尼泊尔的王统和其他一些内容的记载。从藏文史料中发掘资料，来研究尼泊尔的历史，也是较受国外学者重视的一个课题，已有不少论著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毕达克的《尼泊尔中世纪史 (C. 750-1480)》等。

总之，藏文史籍是一个宝库，挖掘越深，收获越大。它是藏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重视它、研究它，将它广泛地应用于对藏族史、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地区史的研究中去，让这笔宝贵的财富造福于今天的历史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昭彰和光大藏族优秀的史学传统，并使这种优秀传统继续下去。

# 目 录

内容概要 .....	(1)
第一章 .....	(1)
第一节 西藏远古情况 .....	(2)
第二节 远古统治西藏的十种情况 .....	(3)
第三节 西藏人类的起源 .....	(3)
第四节 古代十二小邦 .....	(5)
第五节 聂墀赞普的出现 .....	(5)
第六节 穆墀赞普及“天墀七” .....	(7)
第七节 止贡赞普及本教的出现 .....	(8)
第八节 止贡赞普与洛昂达孜的斗争 .....	(8)
第九节 布代贡杰时的经济 .....	(9)
第十节 吐蕃早期本教 .....	(10)
第十一节 赞普“六地列” .....	(10)
第十二节 “八代王”与“五赞” .....	(11)
第十三节 托托日年赞及早期佛教文物 .....	(12)
第十四节 墀年松赞及仲年代如 .....	(13)
第十五节 达日年塞时的政治与经济 .....	(14)
第十六节 囊日松赞执政 .....	(14)
第二章 .....	(25)
第一节 松赞干布的诞生及执政 .....	(26)
第二节 执政初期与造字过程 .....	(27)
第三节 迎请四邻贤者及吞米译经 .....	(29)
第四节 学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 .....	(30)
第五节 建行政区划、订法律、委任官吏 .....	(31)
第六节 吐蕃五如的划分 .....	(32)
第七节 五如之势力范围 .....	(32)
第八节 六十一“桂东岱” .....	(33)
第九节 阶级划分、官制与军事组织 .....	(34)
第十节 七官、六决议大法及六告身 .....	(35)
第三章 .....	(51)
第一节 六标志、六褒贬、六勇饰 .....	(51)
第二节 纯正大世俗法十六条及戒十恶法 .....	(52)







第三节	三法及吐蕃疆界 .....	(53)
第四节	松赞干布迎娶泥婆罗墀尊公主 .....	(54)
第五节	泥婆罗墀尊公主建宫室 .....	(57)
第六节	迎娶文成公主 .....	(58)
第七节	兴建大昭寺、小昭寺 .....	(64)
第八节	兴建昌珠寺 .....	(67)
第九节	建边压寺及再压寺 .....	(68)
第十节	建四压肢寺及九掩口寺 .....	(69)
第十一节	建叶尔巴崖三所依 .....	(70)
第十二节	香雄妃等建寺 .....	(73)
第十三节	吐蕃刑法 .....	(75)
第十四节	恭松恭赞与芒松芒赞 .....	(76)
第十五节	松赞干布埋藏经咒珍宝 .....	(76)
第十六节	松赞干布遗训芒松芒赞 .....	(77)
第十七节	松赞干布与文成、墀尊二公主去世 .....	(81)
2 第四章	.....	(109)
第一节	芒松芒赞执政 .....	(109)
第二节	都松芒杰隆囊执政 .....	(110)
第三节	墀德祖赞执政 .....	(110)
第四节	迎娶金城公主 .....	(111)
第五章	.....	(118)
第一节	墀松德赞诞生 .....	(118)
第二节	桑希内地取经 .....	(120)
第三节	崇佛与反佛之争 .....	(121)
第四节	赛囊赴印求佛 .....	(123)
第五节	桑希助赞普兴佛 .....	(124)
第六节	剪除反佛大臣玛祥 .....	(126)
第七节	迎请菩提萨埵 .....	(127)
第六章	.....	(136)
第一节	菩提萨埵的活动 .....	(136)
第二节	派使者赴内地 .....	(137)
第三节	迎请莲花生 .....	(138)
第七章	.....	(147)
第一节	兴建桑耶寺 .....	(147)
第二节	五妃业绩 .....	(156)
第三节	达热路恭进攻突厥 .....	(157)
第八章	.....	(163)
第一节	桑耶寺开光 .....	(163)